

上古汉语中言说动词“言”的语法化研究

高盈盈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31日

摘要

上古汉语中言说动词使用频率较高, “言”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常用词。本研究以语法化理论为框架, 基于CCL语料库考察上古汉语文献中“言”的语义分布、演变路径及动因。研究发现, “言”在言说动词基础上衍生出多项语义, 在先秦时期广泛使用, 形成了多条语法化路径。其主要动因包括转喻机制、句法位置变化、重新分析、高频使用及语义演变。而“言”在现代汉语中, 基本只具备动词和名词意义, 虚词的语法意义萎缩。“言”的语法化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言说类动词的语法化历程, 对汉语言说动词的语法化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语法化, 上古汉语, “言”, 语料库

A Grammaticalization Study of the Verbal Verb “Yan” in Ancient Chinese

Yingying G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Received: July 16, 2026; accepted: August 17, 2026; published: August 31, 2026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ese, speech verbs were frequently employed, with “yan” being a representative example. This study employs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 as its framework and analyzes the semantic distribution,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and driving forces of “yan” in ancient Chinese texts using the CCL corpu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yan” derived multiple meanings from its verb function, was widely used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and developed several 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s. Key drivers included metonymy mechanisms, changes in syntactic position, reanalysis, high-frequency usage, and semantic evolution. In modern Chinese, however, “yan” primarily carries verbal and

nominal meanings, while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 as a function word has diminishe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yan” reflects, to some exten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speech verbs and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studies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peech verb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Keywords

Grammaticalization, Ancient Chinese, “Yan”, Corpu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言说动词概念源于 Austin 言语行为理论, 经 Searle 等学者发展而来, 汉语学界通常将言说动词与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视之[1]。上古汉语中的言说动词十分丰富, “言”就是其中最为常见的言说动词之一。对于上古汉语“言”的语法化研究, 有助于揭示言说动词的历史演变规律, 也是对言说动词语法化研究的扩充和深化。语法化指意义实在的词汇单位演变为语法功能成分的过程, 中国传统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2]“言”在现代汉语释义中几乎仅保留动词词性的“说话”, 名词指“说出的话”、“谤言”等, 而在上古汉语中除了名、动词性, 另有连词等虚义用法, 这一差异具有语法化研究价值。

在以往关于“言”的语义和语法研究中, 除却没有争议的名词和动词义项以外, 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为代词。最早见之于汉代毛亨、毛萁《毛诗故训传》中, 认为“言”是代词, 指代“我”[3]; 二、为语气助词。以刘淇所著《助字辨略》中“诸‘言’字, 并是语助, 不为义也”[4]的理论为基础, 王引之等均认为“言”在语法化过程中虚化为语助[5], 后来的学者不断深化该理论; 三、为词头。此处的“词头”引用王力《古代汉语》中的观点, 指词缀[6]; 四、为连词。胡适的诗论提出“言”可作连词, 而后李家树提出“言”有“而”的含义[7], 这种观点在语言学界也颇受认同。在这四种主要观点以外, 生发了各种关于“言”语法化研究观点, 如认为“言”又可作为形容词词尾[8]等。而本文认为除却动词、名词义项外, “言”作为虚词在先秦时期只作连词用法。“言”作连词时用法有三: 用于状中之间, 表偏正关系; 用于连谓结构中, 表顺承关系; 用于连接分句、句子, 表顺承关系。

言说动词的研究在语言学研究中意义重大。“言”作为汉语中最常用的言说动词之一, 颇受语言学界的关注, 但多从各地方言中进行切入, 研究其语法化进程, 针对上古汉语中“言”的语法化研究成果目前较为贫乏。本研究通过查阅知网文献期刊, 书籍和互联网网页等, 分析整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借助北大语料库, 对上古汉语时期名篇中“言”的义项分布、使用频率、句法位置、语用功能等进行分析, 找出上古汉语言说动词“言”语料的表象数据下语法化机制的特征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上古汉语“言”的语法化路径和语法化动因, 丰富上古汉语言说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为汉语的语法化研究提供新思路, 也为上古汉语时期典籍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2. 理论框架

2.1. 语法化

1912 年, Meillet 在 *L'évolution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中首次提出“语法化”这一术语[9]。语法化是指语言中原本具有实在词汇意义的词语逐渐演变为承担语法功能的语法成分的过程。这一现象在中国

语言学界传统上被称为“实词虚化”。Hopper 提出了语法化的五项原则,即并存原则、歧变原则、择一原则、保持原则和降类原则[10]。Hopper 与 Traugott 指出,语法化过程涉及两个基本机制:重新分析与类推[11]。Heine 提出了识别语法化的四个参数,包括语义泛化、去语义化、去范畴化和语音磨蚀[12]。这些里程碑式的著作为语法化理论共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构建了全面的研究框架。此后,众多学者对语法化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该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语法化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2.2. 言说动词的语法化

言说动词是表达“说”“讲”“告诉”等言语行为的一类动词,是人类语言中最基本、最常用的词汇类别之一。由于其高频使用和语用功能的多样性,言说动词成为语法化研究的重要对象。Heine & Kuteva 的跨语言考察表明,言说动词在世界许多语言中普遍经历了从具体言说行为到语法功能的演变,常见的发展方向包括:引语标记、标句词、传信标记、条件从句连词、原因从句连词、比较标记、话题标记、语气词等[13]。Chappell 基于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系统研究,进一步总结出言说动词的 13 种语法化功能[14],为汉语言说动词的语法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类型学参照框架。

汉语学界对言说动词语法化的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逐步深入,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言说动词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路径。汉语研究者主要利用共时层面的方言语料,探讨言说动词的多功能用法及其演变路径。林华勇、马喆[15]考察廉江方言“讲”的语法化,联系其他方言/语言进行分析,是国内较早将传信范畴、情态范畴运用于言说动词研究的成果。此后,周娟、蒋梦园等分别对新化方言、资阳方言的言说动词进行了细致的多功能描写和路径构拟[16][17]。

重要语法功能的发展路径。言说动词发展为标句词是汉语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关于标句词的形成机制,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言说动词需经过认知动词阶段才能发展为标句词[18];另一种认为标句词是由引语标记重新分析而来[19]。言说动词常演变为表示信息来源的传信标记。信息来源可分为两类:一是他人来源,即“听说”义标记[20];二是说话人自己,即“自我表述标记”或“重申标记”[15]。不同方言的传信标记在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异。言说动词在部分方言中进一步虚化为句末语气词,表达催促、提醒、反驳、揣测、意外、反预期等多种语气[21]。关于语气词的来源,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经由传信标记发展而来[22];二是从言说动词直接虚化而来[23]。言说动词与人称代词等成分结合发生词汇化,形成固定结构充当话语标记,如“我说”“你讲”“伊讲”等[24],表达主观态度或话语组织功能。

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汉语言说动词语法化的动因机制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重新分析与类推;转喻与隐喻[25];主观化与交互主观化[26]。这些机制共同推动了言说动词从具体行为动词向抽象语法标记的演变。

综上所述,言说动词的语法化研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本研究借鉴上述研究成果,以语法化理论为指导,依托 CCL 语料库,对上古汉语时期代表性文献中的言说动词“言”进行系统考察。本文将从历时演变的视角,考察“言”在不同时期的语义分布特征,构拟其语法化路径,并分析其演变的动因机制,以期为汉语言说动词的语法化研究提供新的个案证据,也为上古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提供参考。

3. 上古汉语“言”在不同时期的语义分布

3.1. 西周时期

本研究借助北大语料库对西周名篇《尚书》《诗经》中的“言”进行检索,经过分析整合,西周时期“言”共计有 4 个义项,列举如下:

1. 说, 讲。例:

(1) 予惟曰:“襄我二人, 汝有合哉?” 言曰:“在时二人。”(《尚书·周书·君奭》)

2. 表达。例:

(2) 诗言志。(《尚书·尧典》)

3. 话语, 言论。例:

(3) 出言有章。(《诗经·小雅·都人士之什》)

4. 连词, 表示递进、顺承、假设等关系。例:

(4) 言告师氏, 言告言归。(《国风·周南·葛覃》)

西周时期“言”最常见的义项是作名词的“话语, 言论”义; 其次是逻辑连词“言”。“言”作连词时, 一般表示递进、顺承、假设等关系。上古汉语中十分注重上下句、语段之间的逻辑区分, 因此多使用明显的逻辑词, 用法与现代汉语中的“而”、“因此”等使用方式相似。“言”的使用比较随意, 基本可以看作一种言说标记。连词“言”经常用于连谓结构, 而连谓结构通常是由两个行为动作组成, 时间上有前后之分或同时进行, 因此虚词连接常有发生。例:

(5) 驾言出游, 以写我忧。(《国风·邶风·泉水》)

在连谓结构中的助词“言”, 连接了两个行为动作, 如例(4)中连接“告”和“归”, 例(5)中连接“驾”和“出游”。区别在于: 例(4)中的两个动作有时间先后之分, “告”师“归”, 告诉的动作发生在归来的动作之前; 而例(5)中“驾”和“出游”的动作同时进行。

连词“言”也用于状中之间, 表偏正关系。如“静言思之”、“薄言掇之”。此类结构中的“言”长期以来存在副词性词尾、语气助词、连词等不同分析。本文认为, 对此类“言”的判定而应结合句法分布、替换能力和语义贡献进行综合判断。首先, 若某形式能够独立连接两个具有事件关系的分句, 并表达顺承、递进等关系, 则更接近连词; 若其不能连接分句, 而只能出现在动词前后固定位置, 且不改变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 则应考虑助词或虚化成分的可能。其次, 真正的词缀通常具有较强的构词约束, 不能自由参与句法组合, 而“静言思之”中的“言”仍保留一定的句法位置特征, 因此不宜简单归入词缀。进一步来看, “言”在状中结构中的功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它既不同于现代汉语中具有明确意义的连词, 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纯粹的语气助词。该用法可能来源于言说动词在高频句式中的虚化: 当“言”后接动作行为时, 说话行为本身逐渐退居背景, 而其连接前后成分的程序功能被突出。

“言”作连词时, 也常用于分句、句子之间, 表示递进、顺承、假设等关系。例:

(6) 我行其野, 言采其蓬。(《诗经·小雅·我行其野》)(表顺承)

(7) 匪手携之, 言示之事。(《诗经·大雅·抑》)(表递进)

(8) 之子于归, 言秣其驹。(《诗经·周南·汉广》)(表假设)

如上, 其语法意义建立在前后句子或语段语境中产生, 用法灵活, 但其本身并不具备语义。这一点又与现代汉语中连词相区分, 现代汉语中“但”“故”等词本身具备“但是”“因此”等含义。而在翻译上古汉语章句中的“言”时, 不可说“言”就具有某些语义, “言”只作为符号。

西周时期“言”的动词义项不是主要用法。“言”表示“说, 讲”时, 常与“曰”连用接言说内容。例(1)中“言”“曰”在上古汉语中都表示“说”, 但各有侧重。“言”表示主动与人说话, 属书面用语;

“曰”则是普通的言说动词，多用于口语。“言曰”可看作是“言于 xx 曰”的缩略，一般用于对话中，表示对另一个说话人的回话。所以例(1)中的“言曰”可翻译为“回答说”。除却最基本的“说，讲”义，动词“言”在西周时期还有“表达”义。例(2)按照字面意思可解释为“诗说心中所想”，但根据上下文语境和现代汉语习惯，一般把“言”译为“表达”。这可以看作是言说动词“言”在言语行为领域的语法化，这时“言”不再是简单的言语行为，而跟说话人的心理活动进行联系，产生了语义延伸。

3.2. 春秋时期

本研究借助北大语料库对春秋名篇《国语》《左传》《论语》进行检索，经过分析整合，春秋时期“言”共计有 9 个义项，列举如下：

1. 说，讲。例：

(9) 言于王曰：“秦师必有谿。”（《国语·周语·王孙满观秦师》）

2. 记载。例：

(10) 不言出奔，难之也。（《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

3. 告诉。例：

(11) 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左传·庄公十四年》）

4. 谈论，交谈。例：

(12)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荡意诸而复之，因贺楚师之不害也。（《左传·文公十三年》）

5. 话语，言论。例：

(13) 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左传·桓公二年》）

6. 诺言。例：

(14) 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左传·文公十三年》）

7. 政令。例：

(15) 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8. 汉语中的一个字或一句话。例：

(16) 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9. 连词，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例：

(17) 书叔姬，言非女也。（《左传·成公十五年》）

春秋时期“言”的动词义项得到丰富，增加了 3 个义项。春秋时期传记类文体盛行，“言”的主语由人转变为书，由此延伸出“记载”义。“言”作动词时，还延伸出“告诉”义。例(11)中“伯父无里言”为倒装语序，这表示当时人们已经有意识地把言说内容放在言说动词前面，“言”的本义已经不再重要，而慢慢沦为言语标记。“言”作动词时，还表示“谈论，交谈”。需要注意的是，此时“言”后接的不再是谈话对象，而是谈及内容。所以例(12)中“言”后的“司城荡”不是谈话对象，而是谈及对象。

春秋时期“言”名词义项增加了“诺言”、“政令”等义项，说明“言”作为一个普通名词逐渐向专

业化方向发展。“言”作名词时，本义为“说出的话”，而当说话人的话有一定效力，此时“言”则延伸出“诺言”的义项。“言”作名词时，也意为“政令”，此时说话人一般为有声望地位的王侯将相，如例(15)中的阳子为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封邑于阳地，率军与楚国相持，故在军队中享有话语权。

而这一时期连词“言”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仅起连接作用，而变化为“释名从句标记”，体现了春秋时期“言”的不断虚化。例(17)的意思是：“《春秋》写明‘叔姬’，是说她已经出过嫁”。显然，“言”后的内容是对《春秋》记载话语的进一步解释。《汉语大词典》中也讨论了“言”的这一语义：“解释引文、词语或某种现象的发端词，相当于‘就是说’或‘意思是’”[27]，在这一用法中，“言”后的内容已经成为了句义的中心。方梅讨论“说”时，将“说”的类似用法定性为“释名从句标记”[28]。由此看，“言”也可看作“释名从句标记”。当“言”引导的小句范围进一步扩大，不限于解释性小句时，就可演变为复句分句间的连接标记[29]。

3.3. 战国时期

本研究借助北大语料库对战国名篇《中庸》《大学》《孟子》《礼记》《楚辞》进行检索，经过分析整合，战国时期“言”共计有9个义项，列举如下：

1. 说，讲。例：

(18) 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孟子·公孙丑上》

2. 谈论，交谈。例：

(19) 位卑而言高，罪也。（《孟子·万章下》）

3. 告诉。例：

(20) 其顺之，然后言其丧筭。（《礼记·哀公问》）

4. 陈述，叙述。例：

(21) 臣愿悉言听闻，唯大王裁其罪。（《韩非子·初见秦》）

5. 话语，言论。例：

(22) 修身践言，谓之善行。

6. 诺言，誓言。例：

(23) 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楚辞·抽思》）

7. 学说，主张。例：

(24)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上》）

8. 汉字中的一个字或一句话。例：

(25) 此谓一言僨事，一人定国。（《礼记·大学》）

9. 连词，起到准标句词的作用。例：

(26) 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

战国时期“言”作动词时基本义仍是“说，讲”，但新义项层出不穷。与春秋时期相同，此时“言”

后接谈及内容而不是谈话对象。例：

(27) 居丧不言乐，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妇女。(《礼记·曲礼下》)

“言”作动词时，也意为“告诉”。此义项也是从“说”延伸而来的，因“言”通常用于主动与人交谈，故从一个普通的言说动词演变为具有指向性的言说动词。“言”作“陈述，叙述”义时，后接言说内容。与“说，讲”义不同，“言”此时一般作间接引语。

与此同时，名词“言”出现了“学说，主张”义。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墨、法、道等流派都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言”逐渐从普通的“话语”义逐渐生发出“学说，主张”义。这表示“言”的语义在战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泛化，也是“言”不断虚化的重要体现。而连词“言”在这一时期也逐渐泛化为准标句词，不再具有真值义，而仅起功能义或程序义。如例(26)中“言”不仅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也可看作连接词，更是发挥了标明话语单位之间关系的作用[30] (p. 94)。

4. 上古汉语中言说动词“言”的语法化路径与动因

本章拟将分析上古汉语中言说动词“言”的语法化路径与动因。根据本文分析可知，“言”作为上古汉语时期常用的言说动词，在不同时期的义项分布、句法位置、语义特征等不尽相同。本章将在此基础上对其语法化路径进行拟测，并分析其背后动因。

根据上古汉语中“言”的具体使用，将其划分在言说行为、言说成果和言说标记三个领域内[31]。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言”的义项分布有较大改变，“言”的言说成果领域和言说标记领域的义项不断得到丰富，且语用功能逐渐虚化。由此可推断出“言”作为言说动词向其他领域的虚化过程，即对上古汉语中“言”的语法化进程进行拟测。

4.1. 上古汉语中言说动词“言”的语法化路径

“言”，本义为“说话”。《说文解字》中认为“言”是“从口、辛声”；一说“言”是来源于“舌”；又一说“言”上部来源于“辛”(古代刑具)，下部来源于“口”。尽管在字体字形的发展本源上出现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言”字，与人的说话器官和说话行为是密切相关的。“言”首先是作为“说话”这个行为的代表被创造出来的，服务于先民最朴素的叙述需求。因此在上古汉语中，动词“言”的规模庞大。然而，以往研究往往将“言”的多种虚化用法归入单一演化链条，这种线性处理容易掩盖不同虚化来源的差异。事实上，“言”的虚化是多条路径并行、交叉、叠加的结果，其语法化过程具有显著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具体而言，连谓结构中的“言”、状中结构中的“言”以及释名从句标记“言”很可能分属不同的语法化脉络：前者源自言说动词向连词/助词的转化，后者可能来自言说动词在特定句法位置上的重新分析，而释名标记则与引语功能直接相关。三条路径在历时层面并非严格先后，而是在西周至战国期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上古汉语“言”至少在以下几个不同范畴内部和不同范畴之间发展出了多条语法化路径，如下：

首先，上古汉语“言”在言说行为内部经历了言说行为－引语功能－引用功能－传信功能这一语法化路径。言说行为领域中的“言”常在主谓结构中作谓语，意为“说”；或后接宾语，表示“对……说”。这两种基本用法都表示具体的言说行为，而后用于对他人话语的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发展出了引语功能和引用功能[32]，常与曰连用引述他人话语。如例(21)中的“言”表示对话人“听闻”的间接引用，为了保持客观立场和中立态度，“言”在引用他人话语时逐渐发展出了传信功能，表示说话人本身也不确定的内容和信息。

其次，上古汉语“言”经历了言说行为－言说成果的语法化路径。从人类物理认知的变化发展中，

“言”的动词色彩向言说内容的转移是符合人类表达的进步和文字发展规律的。在经历了文字的创造、书写工具的发展之后，人们对于文字记录和表达的准确性要求更高。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更是指出，人们对于言说内容的关注往往高于言说行为。因此“言”在其本义“说话”的动词基础上，引申出了其名词含义，主要有“话”、“言论”等义项，又或是根据语境变化，另有富含语言色彩的“谤言”等义项。

最后，上古汉语言说动词“言”经历了言说行为－释名从句标记－准标句词这一语法化路径。从汉语的个性来说，复句语义关系均是由并列发展为主次或从次关系。如“匪手携之，言示之事。”此时“言”的行为已经不再是这句话表达的中心，“言”的内容成为了句子的中心语。因此“言”在句中的作用虚化，中心动作由“示”发出。此时的“言”演变成了一种为符合前后句动作时间逻辑而使用的逻辑用语，特意为语句营造递进的语序。意义在于，解释前一个动作发出的缘由，又具有因果关系。以此为代表的“言”的虚化，逐渐从实词转化为连接语句和语段的虚词。

目前的言说动词语法化研究主要是停留在词义和词性研究，但从物理认知向言语认知的转变，也可以对“言”的虚化路径进行探索。“言”作为一个动词，又有言说动词的特殊性，因此能够将主体、客体和动作充分描述，具备动作的接收者和发出者。物理认识角度即指“言”的动作，表现了人的语言器官对于客体的直接表达，心理上呈现了主体对于客体的被动接受。而语言认知指的是在语言使用中，具备语法功能，最终服务于代表意义的语法功能表达。例如状中结构中以“静言思之”的“言”为代表虚词“言”，与名词、副词、形容词等成分形成了修饰性状语，“安静地好好想一想”陈述了主体此时“思考”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因为主体对于客体的被动感知。此时的“言”没有语义，但是能够反映主客体的隐含要素和内在关系，最后服务于句法结构。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三条路径并非互斥或单向前进。在实际语料中，“言”在连谓结构中的虚化与在状中结构中的虚化可能有着不同的句法触发条件：前者因两个动词短语的相邻而诱发了连接成分的语法化，后者则因状语与中心语之间的修饰关系而促使“言”向副词性标记演变。这两种虚化结果在形式上虽同为弱化了了的“言”，但其语法功能并不一致，说明它们应分属不同的子路径。因此，在构拟“言”的语法化网络时，应避免将不同结构中的虚化混同为一，而应承认其多源交汇的复杂性。

4.2. 上古汉语中言说动词“言”的语法化动因机制

关于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学界存在不同见解，涉及语言内部机制与外部影响的交互作用。Heine 指出，重新分析、听话人的主观理解与形态句法演变之间的关系是语法化动因研究的重要议题[33]。Peyraube 则认为，重新分析、类推机制以及外部借用等因素在语法化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34]。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切入探讨：陈敏忠主张语法化主要源于重新解释、扩展和类推等过程，其本身与句法演变无直接关联[35]；王世凯则提出语境吸收与移觉隐喻同样是语法化的重要触发条件[36]。综合来看，学界普遍认同的语法化机制包括：语义演变、重新分析、类推、重复、语用需求、句法位置、主观性与主观化、隐喻、转喻、语言接触等。下文将结合上述理论，对上古汉语中言说动词“言”的语法化动因进行具体分析。

转喻机制。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看，转喻是语法化的重要手段。在会话中，受经济原则的影响，人们会倾向于用部分代替整体，用可感知的代替不可感知的，即用转喻来进行会话。这个过程是“参照物－目标”的关系。而上古汉语时期(西周、春秋、战国)“言”经历的由言说行为－言说成果－文体的演变过程，正是多次转喻的结果。

(28) 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左传·襄公十八年》)

(29)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

(30) 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韩非子》)

例(28)“与之言”中的“言”显然是言说行为，表“交谈”意。例(29)中“巧言”则是言说成果，为

“话，语”意，此时“言”已转为言说成果范畴，表某种言论。动转名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概念的转喻，在汉语中很常见。而例(30)中“言”已成为一种文体，这是第二次转喻的结果。人们不仅会用部分代替整体，很多时候也会用整体代替整体，以此来完成某种特殊的交际目的，因此派生了“言”这种文体样式。通过两次转喻，“言”完成了从言说动词向言说成果范畴内的文体的演变。

句法位置。句法位置与语法化也是紧密相关的，句法位置的变化通常会影响到语言成分和结构的语法化。“言”作为一个言说动词，在使用时多接宾语或小句，其本身意义并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其后接的内容才是人们想要突出的重点，这种特点导致其很容易出现语法化。如：

(31) 王孙满观之，言于王曰：“秦师必有谿。”（《国语·周语中》）

(32) 夫耳内和声，而口出美言。（《国语·周语下》）

由数据可得，上古汉语“言”在西周时期具有高谓性，多作句子的谓语成分，后常跟宾语或小句，如例(31)。而在战国时期“言”进一步由动词转为表“话、语”意的名词，因而句法位置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谓语分布减少，宾语和主语分布增加。如例(32)“言”充当着宾语成分。而当表“话、语”意的名词“言”化为专指某种特殊文体时，其句法位置就绝对固定了，如《本言》。此时“言”不能再独立出现，而必须与其所谈论对象组合成词，作为词素置于词末。

重新分析是推动“言”语法化的重要机制之一。以[言 + V]结构为例，早期结构可以理解为“说某事，并且实施 V 动作”，其中“言”仍是具有言说义的谓语。例如“言采其莲”可分析为“言(说/表达) + 采其莲(言说内容或伴随行为)”。随着该结构在诗歌和固定表达中的高频出现，听话者逐渐倾向于将“言”理解为引出后续事件的标记，而非独立的言说动作。此时句法分析发生重新调整：原来的[言 + V]被重新分析为[言][V]，其中“言”的事件意义减弱，而 V 成为主要谓语。这一变化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在不同语境中逐步扩展，最终形成类似“于是、就”的顺承功能。例如，“我行其野，言采其莲”中，若仍按照早期结构理解，可以解释为“我在野外行走，说(我要)采莲”。但在实际语境中，采莲才是叙述重点，“言”并不引入新的言说事件。听话者依据语境进行语义重构，将其理解为“我行于野，于是采莲”。这一过程体现了转喻与重新分析的共同作用：言说行为与后续行动在时间和语用上的邻接关系，使言说标记逐渐获得顺承功能。

高频使用是语法化的必要条件，频率越高，语法化倾向越强。从认知角度看，重复刺激会削弱语言形式的本义，使其语义逐渐磨损、适用范围扩大、语用功能泛化。“言”在古代汉语语料库字频统计中位列第 50，累计出现 37,177 次，累计频率达 26.89%，属于高频汉字。而“言”常出现在引语之前，使其慢慢丧失本义，逐步演变为言语标记语。

语义演变。“言”作为一个高频使用的言说动词，其言说本义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弱化和虚化，语义演变成为语法成分。如上文所提到的，“言”在引导小句的时候其言说义逐渐丧失，其主语由具体的人变为抽象的概念。如

(33) 范山言於楚子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左传·文公九年》）

(34) 书曰：“宋杀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左传·成公十五年》）

例(33)中“言”的主语是具体的人“范山”，而例(34)中言的主语被省略了，但根据前文推测其为“书”。“言”的主语由具体变为抽象，表示的意义由概念义变为主观义，对句子真值不再起作用，变为只具有语法功能而无具体意义的标句词，最终完成了语法化。

5. 结论

“言”作为上古汉语高频言说动词，其演变历程既体现了该词汇自身的语义发展规律，也折射出汉

语言说动词语法化的普遍趋势。本研究基于 CCL 语料库,系统梳理上文献中“言”的用法分布,从历时角度勾勒其语法化路径,并分析相关动因机制。

其一,“言”的语义演变呈现出清晰的历时层次。西周时期多用于具体言说行为;春秋阶段动词用法扩展至“记载”“告诉”等义,名词层面衍生出“诺言”“政令”等专门义项;战国时期进一步抽象为“学说、主张”,连词用法则演变为准标句词,整体呈现从具象行为向抽象功能逐步虚化的轨迹。

其二,“言”的语法化是多条路径交织演进的网络系统。本研究归纳出三条主要路径,但需注意它们并非截然独立,而在共时层面相互渗透,在历时层面存在交叉影响。言说行为内部演化:言说行为→引语功能→引用功能→传信功能;言说成果化路径:言说行为→言说成果(话语、言论→专业义项→文体);言说标记化路径:言说行为→释名从句标记→准标句词。

其三,“言”的语法化受多重因素协同驱动。转喻机制推动从行为向成果的语义迁移;句法位置变化为虚化提供结构条件;重新分析促成句法地位的转变;高频使用加速语义磨损;语义演变实现从概念义向程序义的功能转化。转喻、重新分析、句法位置变化等因素共同参与了不同虚化路径的形成。

从语言类型学视角审视,“言”的语法化路径与言说动词跨语言演变规律高度契合,同时展现出汉语自身的类型特征。本研究为汉语言说动词语法化研究提供了历时个案佐证,对认识汉语语法系统的演变机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吴剑锋. 言说动词、言语行为动词与施为动词[J]. 外语学刊, 2021(2): 48-53.
- [2] 沈家煊. “语法化”研究综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4): 17-24, 80.
- [3] 毛亨, 毛萁. 毛诗诂训传[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 [4] 刘淇. 助字辨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7: 35.
- [5] 王引之. 经传释词[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6] 王力. 古代汉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7] 李家树. 宋朱、王“淫诗”、“删诗”说与明人《诗经》研究——一个传统文化互动个案的剖视[C]//中国诗经学会. 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 399-417.
- [8] 陈冰冰, 周掌胜.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释词缀存在的问题[J]. 宁夏大学学报, 2017, 39(1): 32-36.
- [9] Millet A. (1912) L'évolution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Scientia*, 12, 130-148.
- [10] Hopper, P.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11] Hopper, P.J. and Traugott, E.C.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65525>
- [12] Heine, B. (2002) On the Role of Context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Wischer, I. and Diewald, G., Eds., *New Reflec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83-101. <https://doi.org/10.1075/tsl.49.08hei>
- [13] Heine, B. and Kuteva, T.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3463>
- [14] Chappell, H. (2008) Variation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mplementizers from Verba Dicendi in Sinitic 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12, 45-98. <https://doi.org/10.1515/lity.2008.032>
- [15] 林华勇, 马喆. 廉江方言言说义动词“讲”的语法化[J]. 中国语文, 2007(2): 151-159, 192.
- [16] 周娟. 新化方言言说义动词“讲”的虚化及其制约因素[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5): 109-119.
- [17] 蒋梦园. 资阳方言“讲”的多功能用法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2019.
- [18] 李明. 试论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9] 刘丹青. 汉语里的一个内容宾语标句词——从“说道”的“道”说起[M]//汉语句法语义探思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168-184.
- [20] 谷峰. 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说上古汉语“云”的语法化[J]. 中国语文, 2007(3): 231-236, 288.

- [21] 王健. 一些南方方言中来自言说动词的意外范畴标记[J]. 方言, 2013(2): 111-119.
- [22] 罗端. 唐汪话里语气词“说”“说着”的语法化过程[C]//吴福祥, 邢向东.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六).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33-261.
- [23] 黄燕旋. 揭阳方言言说动词“坦”的语法化[J]. 中国语文, 2016(6): 686-694, 767.
- [24] 乐耀. 论北京口语中的引述类传信标记“人说”[J]. 世界汉语教学, 2013, 27(2): 182-191.
- [25] 陶寰, 李佳樑. 方言与修辞的研究接面——兼论上海话“伊讲”的修辞动因[J]. 修辞学习, 2009(3): 1-8.
- [26] 周敏莉. 新邵湘语言说动词“喊”的语法化[J]. 语言学论丛, 2016(1): 305-321.
- [27] 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6.
- [28] 方梅. 北京话里“说”的语法化——从言说动词到从句标记[C]//全国汉语方言学会.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第三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12-126.
- [29] 张桢, 崔越. 上古汉语早期常用言说动词的语法化[J]. 语文研究, 2020(4): 35-44.
- [30] 喻薇. 言说动词“说”和“说”类话语标记的语法化[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 [31] 喻薇, 姚双云. 言说动词“说”的语法化考察[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8, 38(2): 7-16.
- [32] 王双成. 西宁方言“说”“说着”的语法化[J]. 当代语言学, 2022, 24(6): 882-891.
- [33] Heine, B., Claudi, U. and Hünemeyer, F.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4] Peyraube, A. (2002) L'évolution des structures grammaticales. *Langages*, 36, 46-58.
<https://doi.org/10.3406/lgge.2002.2400>
- [35] 陈忠敏. 语法化的类别、特点及机制[J]. 当代修辞学, 2021(6): 1-14.
- [36] 王世凯. “这样/那样”的信疑用法和语法化——兼与“的样子”比较[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2(1): 83-92.